

陟彼景山

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

戴燕主编

何兆武

李学勤

章培恒

王水照

裘锡圭

朱维铮

陆谷孙

张信刚

兴膳宏、川合康三、金文京

中华书局

陟 彼 景 山

——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

戴 燕 主编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陟彼景山: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/戴燕主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7.1

ISBN 978-7-101-12171-1

I. 陟… II. 戴… III. 学者-访问记-中国-现代 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29008 号

书 名 陟彼景山: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

主 编 戴 燕

责任编辑 贾雪飞 周 语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9×1194 毫米 1/32

印张 6 $\frac{7}{8}$ 插页 4 字数 120 千字

印 数 1-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2171-1

定 价 36.00 元

序

戴 燕

二〇〇六年，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出版，轰动一时。在这本书中，何先生讲述了他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形，是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、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。与钱锺书同样写抗战时期几个颠沛流离的大学教师的小说《围城》不同，何先生是在几十年后去回忆那一段时光，他强调更多的还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义、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，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，他也有自己的看法，并且非常坦率，因此，不少人看了这本书以后，便开始期待传闻中的他的下一部“上班记”。

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事，我们一度住得很近，经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。认识何先生之前，我已经受益于他翻译过的不少名著，那时恰好替《书城》杂志帮忙，就同彭刚商量，给何先生做一篇访问。彭刚是何先生的学生，为人求学都有几分神似何先生，他做的这个访问因而相当体贴，虽然不是正式的“上班记”，但何先生还是谈到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

究所工作的经历和见闻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，也谈到学术与政治、学者与权力的关系。

那一年，正好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，因为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相识超过二十年，在上海的第一个访问便约了朱先生，谈的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“国学”问题。朱先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，他的批判性极强，教书、写作都带有激情，就如过去人常说的一句话：对待朋友像春天般温暖，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当然，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，甚至较真到苛刻的地步。由于我说过杂志的篇幅有限，访谈不能做得太长，当我们把根据录音整理好的谈话稿交给他过目，再拿回来时，就变成了一篇几乎是改写过的、删掉了所有问话的整整齐齐的稿子，从国学到经学、从晚清到民国，逻辑更严密，论述更清晰，话锋也更犀利。这篇题为《“国学”答问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书城》的二〇〇七年第九期。

等到访问何先生的《〈上学记〉之后》于同年十一月发表，我带着《书城》杂志回到北京，访问李学勤先生。李先生是在二〇〇三年前后从中国社科院回到清华大学的，从那以后，我们才有机会比较多地见到这位忙碌的学者。我们是既佩服他的睿智、博学，也佩服他的自律。很早以前就听到一个故事，说李先生家里始终只有八个书柜，多少年里就是只保留这八柜子书，后来房子大一点，才增加到十几个柜子。对李先生的访

问，自然离不开上古史，当初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，目的是要证明中国确实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，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，学术性、政治性的议论都有。访谈时，我有意避开了过分政治化的提问，但还是请他从考古专业以及比较文明史的角度，谈他的上古史观、他的学术理念，甚至他一生的抱负。这篇访谈很快发表在《书城》的二〇〇八年第一期。

我是到了复旦大学以后，才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触，慢慢地熟悉起来。王先生曾说我和他先后毕业于同一所大学，先后任职于同一个研究所，然后都到了复旦，这是一种缘分。而我对他这一班前辈的了解，主要是由于多年前曾仔细读过他参与编写的北大一九五五级“红皮本”文学史，又反复读过他参与的另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“绿皮本”文学史。对他的访问，因此也就这样是从“文学史”开始。回首往事，听他讲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气氛下，当时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文学史。他们要“破”的是什么，“立”的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一做法会受到鼓励、成为流行？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中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？这篇访问记也发表在《书城》的二〇〇八年第九期。

在复旦大学，我认识最早的其实是章培恒先生，那时我才大学毕业不久，后来很多年，每到上海，拜访章先生都是一个固定节目。我认识的章先生，在爱憎分明

这一点上，与朱维铮先生是颇为相似的，而在讲义气方面，他“任性”、不顾一切的程度，在学界中也实属罕见。我们到上海时，他已经生病，我在他给研究生开的古代文学课上曾听过一节，只见他不但课上得规规矩矩，西装领带也穿戴得一丝不苟。做访问的那一天，他已经脚肿得厉害，必须要将两条腿平举，怎么坐都不舒服，可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答问，还是冷不丁冒出一句幽默的话来，讲他一贯坚持的“文学是人学”，讲鲁迅、顾颉刚。这篇访问发表在二〇〇八年第十二期的《书城》。

学英文的人，大概没有不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英汉大词典》以及新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汉英大词典（上）》，这两本大词典的主编，都是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先生。就像章先生一样，陆先生在复旦、在上海都受到特别的尊重，有一段时间，他隔三岔五地给《南方周末》等报纸写文章，讲述他在复旦六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，里面有很多掌故，使我们这些外来人对复旦的历史也能有一点直观感受，所以和陆先生相识虽晚，却也一见如故，并不陌生。陆先生是一个对语言、文学都极其敏感的学者，人本来也相当温和，可是在现实中，似乎也还是有他内心的不平和无奈。对他的访问，发表在《书城》二〇一二年第五期。

二〇一五年恰逢裘锡圭先生八十寿辰，三十多年前，他就是教我们古文字学课的老师，他学问的严谨、

做人的正派，有口皆碑。本来在北京、上海，我们都住同一个院儿，经常碰面，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，早就预约的访问竟一直拖到他八十岁这一年。访问从他倡议的古典学重建开始，谈到现代学术史上的“古史辨”派，也谈到形形色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。因为是给《书城》量身定做，访问时免不了也将裘先生“拉下水”，请他发表对有关现实问题的看法，裘先生不仅回答得爽快，而且就像他讨论学术时喜欢用的一句口头禅“实事求是”，在现实世界里，他也不愿意苟且。这篇访问发表在《书城》的二〇一五年第九期，刊出当日便在网络上疯传，令人意外。

二〇一一年章培恒先生去世，翌年朱维铮先生去世，就在编辑校对本书的过程中，陆谷孙先生突然去世，这都使我们深感怅然，而庆幸的是，在他们生前，我为他们都做了这样一篇访问。

这些年陆陆续续访问的都是这样的前辈，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这种大转折、大动荡时代的一辈人。虽然没有刻意规划，却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机缘，得与这些前辈学者谈话，并将它们记录下来，与更多的读者分享。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“私心”的话，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、一代有一代之思想，这一代学术、思想的风气正是体现在一个个学者身上，而通过对那一辈学者的访问，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，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，在那一段历史中的

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——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？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，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，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，他们又如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？从时代的影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，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人，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，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，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，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“鉴往知来”。

二〇一〇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书，周末常随城大的朋友登山，张信刚先生是这小小登山队里的元老，因此我们有过不少谈话。认识张先生，还是在他当城大校长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偏偏在推动中国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方面做过巨大投入。二〇〇七年他退休以后，好像比过去更加忙碌，围绕人文与科技、世界与中国等话题，奔波于世界各地，观察、写作、讲演。张校长出生在沈阳，一九六〇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，由于是海外“保钓”运动的骨干，一九七二年就回国见到周恩来总理。他也属于上一代知识分子，然而他经历过的岁月，与和他同岁的陆谷孙先生就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岁月，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也全然不同，我为他做访问，由此特别留意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，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中国。他们的理想在哪里，理想又如何照进现实？这篇访问发表在《书城》的二〇一〇年第九期，收入本书，就是为了提供一种历史的对照。

本书的压轴，即对兴膳宏、川合康三、金文京三位日本学者的访问，事实上做得最早，曾发表于《文学遗产》一九九九年第一期。那还是在一九九八年，葛兆光到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，我随同前往，那时经常见到的就是兴膳宏等几位教授，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，他们当时就已经是顶尖学者。兴膳教授与朱维铮先生同岁，青少年时代是在“二战”中度过，一九六五年读博士时第一次到中国，除了访问北大、复旦，还去过“革命圣地”延安、韶山。他研究的是中国古典，可是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家已经完全不同，他对现代中国同样怀着美好的想象和热情。当然，他首先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者，在他与川合康三、金文京教授身上，都看得到日本学者特有的那种细致、沉着的作风，而他们也都在告诉我们，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，研究中国会带入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经验和方法，中国与日本在这里会是以怎样的方式碰撞、交融。将这篇访谈收入本书，也许可以提供又一种不同的历史对照。

为上一代学者做的这些访问，这次能够结为一集出版，首先，当然要感谢所有的受访者，谢谢他们的支持和配合，这些访问稿，都是他们亲自审定的。也要感谢彭刚，允许我收入他对何先生的访问。其次，是要感谢帮助我整理过录音的王水涣、雷仕伟、杜斐然、陈文彬、吴湛、周语等几位年轻朋友，访问兴膳宏等三位教授时，还得到过现任京都大学教授的木津祐子的帮助，

也要谢谢她。最后，要感谢中华书局的老朋友徐俊先生，还有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的余佐赞先生，是他们促成本书的出版。

书的题名“陟彼景山”，取自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，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，所以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，歌中唱道：“陟彼景山，松柏丸丸。是断是迁，方斫是虔。松桷有梲，旅楹有闲，寝成孔安。”意思是登上高山，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，将它们砍伐、搬运下来，建成宗庙，用于祭祀祖先。“陟彼景山”，在这里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，只不过这里说的是学术上的传承，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前辈学者的敬意。

二〇一六年七月底于复旦大学

目 录

序（戴燕）

何兆武

《上学记》之后 /1

李学勤

“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” /23

章培恒

述学兼忆师友 /43

王水照

文学史谈往 /67

裘锡圭

古典学的重建 /87

朱维铮

“国学”答问 / 119

陆谷孙

你这一生离不开它 / 135

张信刚

复兴中华相期在明天 / 163

兴膳宏、川合康三、金文京

历史与现状——漫谈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
研究 / 181



何兆武

《上学记》之后

何兆武

1921 年生于北京。1943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，1946 年西南联大外文系研究生毕业。1956—1986 年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，1986 年起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、*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*，主要译著有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、康德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、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、柯林武德《历史的观念》等。

期待《上班记》：个人化的学术史

彭 刚：《上学记》出版后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因为您自己亲历的历史，和我们根据后人记叙看到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。传说以后还会有一本“上班记”，讲您解放后的经历，能不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？

何兆武：这本书并没有写。《上学记》的缘起主要是谈天，文靖同志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解放前我们的生活情况，没有怎么涉及以后的事情。她当时来聊了几次，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了，她自己觉得有点兴趣，就继续下来写成了一本书，这些都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。

彭 刚：我们猜测大家对“上班记”感兴趣的原因，一个是您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重大政治运动的亲历者。您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，而那里，也就是原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，在历次运动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，您的个人经历也是重要的历史

资料；再就是您曾经和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不少人物，比如侯外庐、谢国桢，还有李泽厚等，都有过近距离接触，大家想通过您的讲述来了解一下您亲历的“个人化的学术史”。

何兆武：这个工作得找核心的人物，我是边缘化的。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三十年，但那些运动我都是槛外人。原来历史所有个叫田昌五的同志，他了解一些具体情况，后来我们在北京见过几次面，以后他到山东大学去了。我们知道古奇（G. P. Gooch）有一本很著名的书《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》，是研究十九世纪史学的人都要看的。我有一次曾向田昌五说，你应该写一本“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”，那时候我们历史所是一个很复杂的阵地，他也很愿意写，因为他了解一些内情。后来他没来得及写就去世了。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和现实政治纠缠太深，不是不了解内情的纯学者所能率尔操觚的。

彭 刚：不知道事实固然不能了解政治运动的很多方面，但您也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呀，这也牵涉到大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不同个体的命运和感受。比如，您曾经谈到林彪爆炸后不同人等的反应，又比如当时的干校连长专门找人借钱，包括被专政对象的钱，我觉得这些细节都挺有意思的。

何兆武：他也没有找所有人借钱，只找有把柄的以及一些被镇压对象来借。这些政治运动及其内幕运作还